

商周图像文字研究

SHANGZHOU TUXIANG

WENZI YANJIU

刘正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014011498

K877. 34
03

刘
正 著

市哲学社会科学2011年专项研究资助项目
中国的图像文化史研究

商周图像文字研究

SHANGZHOU TUXIANG

WENZI YANJIU



K877-34
03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北航

C16976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周图像文字研究/刘正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458-0811-7

I. ①商… II. ①刘… III. ①金文-研究-中国-商周时代 IV. ①K87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6176 号

责任编辑 孙 莺
封面设计 范昊如
技术编辑 丁 多

商周图像文字研究

刘 正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0.5 字数 250,000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811-7/K·120

定价 30.00 元

目 录

导 言 商周图像文字研究的历史回顾及其问题点 / 1

- 一、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回顾 / 1
- 二、本书的研究意义和内容 / 5
- 三、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 / 8
- 四、本书的研究重点、难点及其创新之处 / 9

第一章 试释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蚩尤 / 11

- 一、商周彝铭学对“蚩”、“尤”二字的识读与考证 / 11
- 二、黄帝“画蚩尤像”神话的原始宗教含义 / 16
- 三、“蚩尤”之读音和内在含义的最新解读 / 17
- 四、“蚩尤”和炎帝、善卷关系之研究 / 18
- 五、“蚩尤”和青铜器上饕餮图像的关系研究 / 21
- 六、“蚩尤”铭文铜器群的古文字学考察 / 21

第二章 “感天而生”说神话的思想史研究 / 24

- 一、“析子孙”铜器铭文的真正内涵 / 26
- 二、“感天而生”说神话 / 29
- 三、“通”和“感天而生”说神话的思想史研究 / 40

第三章 火历、火神信仰的成立史研究 / 43

- 一、“火历”问题的提出 / 43
- 二、荆楚文化传统中的“火正”问题 / 44
- 三、商周原始宗教信仰中的“火祭”问题 / 47

四、对商周彝铭中记载“火历”的古天文学研究 / 51

五、火历、太阳崇拜和改火 / 54

六、神农和火 / 57

第四章 汤“以身祷于桑林”的神话及其展开 / 60

一、对以《山海经》为核心的龙和雨水关系说的考察 / 60

二、卜辞和卦爻辞为核心的龙和雨水关系说的考察 / 69

三、焚巫、脔和作土龙的祭祀仪轨及其自然观 / 74

四、商周彝铭中记载的求雨祭祀 / 80

第五章 洛书传说的图像考古学研究 / 82

一、洛书的考古发现 / 82

二、从图像演绎角度推导河图、洛书的成立过程 / 85

三、“结绳而治”传说的研究 / 91

四、河图、洛书神话的原始宗教学意义 / 96

第六章 商周彝铭中鸟图像的原始宗教含义 / 104

一、商周彝铭中鸟图像的分类 / 104

二、以鸟名官说的研究 / 105

三、商人的“天命玄鸟”神话及其信仰 / 107

四、周人的“岁在鹑火”神话及其信仰 / 109

五、凤鸟信仰和太阳崇拜四大神话 / 111

第七章 西王母图像及其相关神话的文化史研究 / 116

一、上古史料中记载的西王母 / 116

二、商周甲骨史料中记载的西王母 / 119

三、商周彝铭中记载的西王母 / 120

四、西王母神话在商周原始宗教信仰中的特殊意义 / 122

第八章 “绝地天通”说的图像思想史研究 / 125

一、商周甲骨史料中记载的地天观念 / 126

二、商周彝铭中表现出的地天观念 / 127

三、商周宗教祭祀活动和巫师/国王的职责 / 129

四、商周时代人(民)的造像的考古学研究 / 131	
五、商周时代神(饕餮)的造像的考古学研究 / 133	
第九章 商周史官制度的神话起源及其宗教学职能 / 136	
一、古代神话记载中的史官 / 136	
二、巫史问题 / 138	
三、史官和商周原始宗教 / 140	
第十章 商周时期的图像讖纬及其思想研究 / 144	
一、图像讖纬思想的成立及其发展 / 145	
二、象辞和兆辞之间的偶然性关联 / 148	
三、象辞的形而上特点研究 / 150	
跋 / 159	

导 言

商周图像文字研究的历史 回顾及其问题点

本书要求作者必须同时具有汉语言文字学(尤其是古文字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哲学、海外汉学(尤其是国外的中国早期思想研究)、商周考古学的多重学术研究背景和知识结构,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和挑战性。更具体地说,从20世纪50年代诞生了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和神话考》这一学术经典之后,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处于停滞不前这一尴尬局面。这是我决定从事此课题研究和著述的主要原因。

一、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回顾

注意到上古神话和商周原始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研究,也许是近现代神话学理论传入中国学术界后的一个显著成果吧。

产生在20世纪前半期的重要著作有: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学术专著,推动了对上古神话进行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进程。

这一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论文大致有:钟敬文的《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和《盘瓠神话的考察》,卫聚贤的《天地开辟与盘古传说的探源》,陈梦家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闻一多的《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和《说鱼》,孙作云的《蚩尤考》、《后羿传说丛考》和《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所见之图腾遗痕》,江绍原

商周图像文字研究

的《易卦如何得名》等。

在这一阶段出现的论著是在神话学的传播和建立、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传播和建立这一双重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在学理上受日本学术界和法国学术界的影响尤其显著。尤其是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对《山海经》的研究和法国学者库拉奈(Marcel Granet)对《诗经》的研究,一时间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楷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日本的中国神话研究又是法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个附庸和翻版。)

今天来看,我们可以把 20 世纪前半期的研究模式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上古神话进行上古史和古文字学的考证,如孙作云、徐旭生、闻一多、陈梦家、丁山等人。但是,此类研究看似科学而且严谨,可是依然问题不少。张光直在《商周神话之分类》一文中就曾指出:“绝大部分的神话先殷史,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在考古学上找到根据的。”^①

另一类是对上古神话进行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解释,如钟敬文、卫聚贤、江绍原、顾颉刚、尚秉和等人。

这两个研究模式为上古神话和商周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发展奠定了大致走向。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 30 年间,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以宏大的气势、丰富的史料和深厚的学术视野成为这一领域这一时期他人难以企及的学术经典。在这一时期,除了胡厚宣的《甲骨文商周鸟图腾的遗迹》一文还值得一读之外,似乎值得肯定的论文并不多。就是在远离了文革和政治斗争的台湾学术界,值得肯定的著作也同样屈指可数。比如,杜而末的《山海经的神话系统》、《易经阴阳宗教》和《老子的月神宗教》,王孝廉的《中国的神话与传说》等,基本上还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模式来解读上古神话。虽然也有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之一:中国创世神话之分析与古史研究》、《商周神话之分类》和《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等名作产生,但是毕竟杯水车薪。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最近 30 年来,随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一些零零碎碎的观点也曾多次冲击着对本课题的研究。如,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何新的《诸神的起源》、《诸神的起源续集:〈九歌〉诸神的重新研究》到现在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253 页。

的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原型重构》、《诗经的文化阐释》等关于上古神话和原始宗教意义的研究论著。但是最终他们的研究又多局限在以文化人类学来解释上古神话和原始宗教思想上,忽视了利用古文字学史料,从历史学和古代文学角度对上古神话和商周原始宗教信仰的形成进行实证性的思想史研究,造成了他们的结论时有轻率、缺乏可信度和坚强的文献支撑等弊病。而且,他们对最近十几年来历史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具体年代的重大研究项目和阶段性成果缺乏真正的理解和使用,这使得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们的结论和学术体系很难得到历史学界最新成果的验证。

另一方面,在中国思想史学界有些学者也撰写了几部相关研究著作。如朱天顺的《中国古代宗教初探》、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和《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詹鄞鑫的《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梁钊韬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何星亮的《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等等。坦率地说,他们的著作论多于史、论多于考的现象十分突出,缺乏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学术基础和考证过程,其中暴露出来的一些虽然时髦却颇不专业的学术见解,也颇令人担忧。仅举两例加以说明,首先是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中对儒家思想产生过程的论述:

儒家注重文化教养,以求在道德上超离野蛮状态,强调控制情感、保持仪节风度、注重举止合宜,而排斥巫术,这样一种理性化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文化史的漫长演进的结果,它是一种由夏以前的巫覡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又由祭祀文化的殷商高峰而发展为周代的礼乐文化,才最终产生形成。^①

他俨然将巫覡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作为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断代特征,这显然很值得推敲。因为我们只需要看看《论语·为政》中孔子有关“夏礼”、“殷礼”和“周礼”的论述就立刻可以发现上述观点是如何的牵强了。严一萍在《夏商周文化异同考》一文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综观察家三代文化,纵有异同之处,未逾损益相因,寻其本则一脉相承,未尝有变焉。”^②

^①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页。

^② 《大陆杂志特刊》1952年第1期,第394页。

而且,大量考古学证据也证明了商周时代同时存在着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而并非是如陈氏及一些学者所设想的那样“由夏以前的巫觋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又由祭祀文化的殷商高峰而发展为周代的礼乐文化”。既然三代文化的断代特征不是如陈氏等人所构想那样,则原始儒家的产生也就不可能如其所言是在周代的礼乐文化出现后“才最终产生形成”的。相信作者如果对商周国家礼制有考古学层面的深刻理解和独到的古文字学佐证,他应该不会提出如此之论。

再如该书对《国语·楚语》中观射父之说的分析和研究,他首先引用了杨向奎的观点,然后他大胆地得出结论说:

按照观射父所说,中国上古的原始宗教经历过三个阶段:民神不杂、民神异业——民神杂糅、家为巫史——绝天通,无相侵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种正、反、合的辩证演进,但这样的一种演变,并不是宗教自身自然演化过程的体现,而是由于在第二阶段上的九黎乱德而导致的一种社会性的变化。^①

陈氏此说没有忘记要“让功”给观射父,他的那一句“按照观射父所说”尤其见特色。可是观射父是在哪里这样说的呢?上述结论所建构出的“一种正、反、合的辩证演进”,如此先进和现代的逻辑模式完全是陈氏本人的思想,而非观射父的思想。还是杨向奎老老实实在地首先表明了不能完全明了观射父的意思^②。陈氏尚且如此,其他诸公的著作就更不足观了。

20世纪初期以来对上古神话和商周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保持高度热情的日本和欧美汉学界,诸如,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i Maspero)、日本学者池田末利和白川静、美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俄罗斯学者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英国学者布德(Bodde)和白安妮(Anne Birrell)等人,他们更多关注的却只是某一神话或者某一原始图腾信仰在商周时代的宗教含义,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加之他们对上古文献史料理解的局限,不可能实现在这一问题研究上的重大突破。仅举一例加以说明。

①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页。

② 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3页。

艾兰在《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一书中主张：

殷商有十日的神话，殷商的统治组织是在与这些太阳的图腾关系中构成的。这个神话对殷商来说是特殊的，与他们的统治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当相信一个太阳的周灭商之时，这个神话其实已失去了它的早期意义，它的体系也失去了完整性。^①

上述观点实在新奇而且大胆，也就更加不靠谱了。试问：十日传说是否为商代所独有？周代何时具有一个太阳信仰的？最重要的是：上述观点的立论依据是什么？考古学证据和古文字学证据又是什么？

标新不能离本，立异要有根据。如果一味地贪图创新，难免失去立论的文献根据和考古证据。

在中国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已经日益国际化的今天，除了依靠本国学者的努力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而目前为止，从事这类研究并取得成功的著作当推王晖的《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一书，可说具有填补国内外学术空白的重大意义。

二、本书的研究意义和内容

如果不能揭开上古神话在商周原始宗教信仰形成过程中具体的作用和学术价值，那么难免就会出现对商周思想和原始宗教信仰研究上的误读。比如，一百多年前在西方学术界诞生的所谓“互渗律”和“原型批评”理论就是很典型的两个在上古神话和原始宗教信仰研究领域出现的研究理论模型。

“互渗律”这一概念出自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Levy-Bruhl Lucien)。按照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的定义而言是这样的：

一言以蔽之，我们将拒绝把原始人的智力活动归结为我们的智力活动的较低级形式。我们最好是按照这些关联的本来面目来考察它们，来看看它们是不是决定于那些常常被原始人的意识存在物和客体的关系中发觉的神秘关

^① [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杨民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商周图像文字研究

系所依据的一般定律、共同基础。这里，有一个因素是在这些关系中永远存在的。这些关系全都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包含着那些作为集体表象之一部分的人和物之间的“互渗”。所以，由于没有更好的术语，我把这个为“原始”思维所特有的支配这些表象的关联和前关联的原则叫做“互渗律”。^①

“互渗”概念的英文和法文是 participation，而互渗律的法文是 *Davantage l'interopérabilité dégoutter*，英文则是 Mutual permeability of law，一般是指两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相应的也就有了神话研究中的“原逻辑的思维”（prelogical thought）这一概念。

何谓“原型批评”？原型（archetype）一词由希腊文 *arche*（原初）和 *typos*（形式）组成。根据张中载的定义，“原型批评以原型理论为基础，以结构主义方法为手段，对整个文学经验和批评做原创性的分类对比，寻求文学的本质属性……所谓原型批评，简而言之就是从神话着手从宏观上研究文学艺术自身的内在类似性，即其程式、结构模式和原则，并从整体上探寻文学类型的共性和演变规律。因此，原型批评也称神话批评”。^②

张中载在《原型批评》^③一文中接着总结说：

弗莱是原型批评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但是，原型批评能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流派，却是弗莱广采博纳各家之说的结果。对弗莱建立原型批评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格兰人类学家 J. G. 弗雷泽，另一个是卡尔·荣格。弗雷泽在他的传世巨著《金枝》（1890—1915）中精辟地论述了仪式、巫术、神话等人类原始文明的源流关系，使该书成为神话研究的奠基之作。弗莱受到弗雷泽的启示，着手在神话中探寻构成神话的普遍模式，从原型象征中发现人类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最深层的意义。弗莱说：“文学产生于神话”，“文学是神话性思维习惯的继续”，“因此，神话模式——即有关神祇的故事……是一切文学模式中最抽象、最程式化的模式。”（《批评的剖析》）他把神话看作是文学的本质属性的基础，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在“由人类的希

①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69 页。

②③ 张中载：《原型批评》，《外国文学》2003 年第 1 期。

望、欲求和忧虑构成的神话世界中写成的”。弗莱公开宣称,他的原型理论是受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启发创建的。因此,他把自己的原型批评理论也称为荣格的批评理论。美国“新批评”代表人物威廉·威姆塞特和克林斯·布鲁克斯说,弗莱的原型是从荣格那里借来的,并且说,所谓原型,就是原初意象,它是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荣格认为,原型在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他说:“每一个意象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

原型批评家认为,最基本的文学原型是神话,各种不同的文类只不过是神话的延续和演变。弗莱说,原型最基本的模式是神话,神话是所有其他模式的原型,而其他模式只不过是“移位的神话”,即神话不同的变异。尼采认为,没有神话,没有希腊神话中的狄奥尼索斯酒神,就没有希腊悲剧。荣格也把神话看作是艺术作品的源泉,他把原型称作是神话研究的“母题”。由于原型和神话的密切关系,有的批评家也称原型批评为神话批评,或称其为“神话原型批评”。

这两个研究理论模型也曾对我国学术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当时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们对中国上古神话表现出的哲学和原始宗教的含义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学价值,在认识上一直模糊不清。

而最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在利用上述理论研究模型时又出现了两个发展走向截然不同的研究倾向,这是应该值得我们给予特别关注的。一个倾向是将上古神话研究泛宗教功能化,似乎每一个神话的出现全是对一种宗教仪轨的说明,这一倾向必将导致中华文明的巫术创始说。这一点在国外汉学界又表现极其突出,甚至也影响到了国内学者的思维模式。另一个倾向就是将上古神话研究泛民俗化,完全无视上古神话背后富于哲学和宗教内涵的特殊性质。

因此,本书的研究先从商周图像文字史料开始,对上古神话的来源和含义进行全新的解读,再以此为基础,研究这些神话在商周哲学和宗教信仰中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功能,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提供真实、具体和实证的考证性研究成果。因此,不论对于中国学术界还是对于国外汉学界来说,总结和研究上古神话在商周宗教信仰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都是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的一项科研课题。

本书在导言“商周图像文字研究的历史回顾及其问题点”之后,大致依次由“试

释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蚩尤”、“感天而生说神话的思想史研究”、“火历、火神信仰的成立史研究”、“汤以身祷于桑林的神话及其展开”、“洛书传说的图像考古学研究”、“商周彝铭中鸟图像的原始宗教研究”、“西王母图像及其相关神话的文化史研究”、“绝地天通说的图像思想史研究”、“商周史官制度的神话起源及其宗教学职能”、“商周时期的讖纬图像及其思想研究”等十章内容组成,约20万字篇幅。对商周时代十个重要的神话在建构商周原始宗教思想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全新的解释和研究,从中找出中国思想和文化在早期时代的若干重大特点和本质属性,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具体而真实可信的证据和说明。

三、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入手,对上古神话进行甲骨学、金文学和考古学的考证和分析研究,力求找出这些神话的内在含义、成立年代和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对上述神话在建构商周原始宗教信仰过程中的作用和学术价值进行详细的考证性的研究和学术史的总结。同时紧密结合海内外汉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给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神话学、宗教学上的学术评价。

张光直在《商周神话之分类》一文中首先对商周神话材料的使用进行分类研究。他主张:

第一,我们的神话材料必须要包含一件或一件以上的故事。

其次,神话的材料必须要牵涉非常的人物或事件或世界——所谓超自然的、神圣的,或者是神秘的。

第三,神话从说述故事的人或者他的同一个文化社会的人来看却决然不是谎。他们不但坚信这些假的神话为真的史实——至少就社会行为的标准而言——而且以神话为其日常生活社会行动仪式行为的基础。^①

本书研究方法主要是本着对被研究对象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宏观考察”和“古文字学解读的微观考证”相结合的这一大方针,处处紧扣上古神话和商周原始宗教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54—255页。

信仰之间的在考古发掘实物图像上的对比和联系,采用文献证据、考古证据、图像证据、民俗证据四者相结合的具体操作方法,对本书进行实证性、对比性的研究和著述。思想史研究的宏观考察要求我们先分析商周宗教信仰和上古神话之间表现出的那种本质上的一致性,这是对两者进行解读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而古文字学解读的微观考证则需要利用现今出土的文献证据,对上古神话的内在含义及其图腾意义进行全新角度的评价和研究,在揭开一些历史久远的重大神话背后所隐含的原始宗教意义之时,也清晰地梳理出从上古神话到原始宗教的形成之间的发展脉络。

特别想说明的是:本书不想使用目前学术界颇为热点的文化人类学(或称文学人类学)、民俗学用于研究上古神话这一时髦而流行的研究方法。虽然我对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内的代表人物萧兵、叶舒宪等人十分尊敬。如果归纳本书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利用图像演绎考证法,还原商周重要图像的真正文化内涵,为中国古代图像文化史的源点研究奠定基础。

四、 本书的研究重点、难点及其创新之处

本书的研究重点和难点也是国内外学术界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和疑难问题,即:先秦诸子著作中记载的神话的图像问题和《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中出现的神话的图像问题,它们究竟是传承有序的文献记载或口头文学的产物,还是先秦诸子、《诗经》、楚辞的作者们各自创作的作品?《山海经》中各个地区出现的神话及其图像产生的历史年代如何界定?等等。至今尚未有系统而权威的上古神话文献资料汇编和校对注解的著作出版。这给我们准确而全面地把握原始文献增加了难度,进而也成为我们首先要攻克的重点和难点。

我在本书中采纳了张光直在《商周神话之分类》一文中提出的四类神话的划分,即自然神话、神仙世界的神话、神仙世界之与人间世界分裂的神话、天灾的神话与救世的神话及祖先英雄事迹系裔的神话。

经过本书作者最近十几年来的前期研究,本书研究者的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乃在于:

第一,我们是建立在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部分和历史年代学断代工程前期成果的使用和认同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上述基础之上对上古神话和商周原始宗教

信仰进行的最新、实证性的研究和考证。

第二,我们主张:商周原始宗教思想和祭祀活动有一个深厚的上古神话作为文化背景和支撑。

第三,我们发现:上古神话中出现的重大人物(如蚩尤、黄帝、神农、西王母等)和重要的神话(如求雨神话、感生神话、洛书神话等)几乎都可以在甲骨史料和商周彝铭史料中找到其具体存在的证据和原型。

第四,我们提出:在传统的构成商周原始宗教信仰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三大要素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独立存在的第四要素——神话及其图像系统,甚至它才是四要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我们特别对商周神话中的一些著名的神话传说如凤鸟神话、求雨神话、太阳神话等的内在意义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解释的新说。

第一章 试释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蚩尤

商周古文字史料中是否存在对“蚩尤”的记载一直是学术界很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可是,迄今为止,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就是:古文字学界和考古学界,乃至古代文学界至今对此一直是付诸阙如的。过去,有人曾提出上“止”下“虫”组成的“蚩”字就是“蚩”字,此说显然过于臆断,而且缺乏具体的论证过程和坚实的史料支撑,不但根本不足为信,反有故弄玄虚之嫌。关键是此说实际上是直接抄袭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和神话考》一书中的观点而来:“其下从虫,上从止,显然是蚩尤之蚩的本字。”^①

虽然学术界至今并没有给出“蚩尤”存在的真实可信的古文字学和考古学证据,但是并不妨碍著名学者李学勤长期以来大声疾呼中华文明是炎、黄、蚩三祖的产物。^②据说,此说今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和支持效应。

在上古文献史料中大量出现的“蚩尤”,难道在古文字学和考古学中一点也找不出关于“蚩尤”的文字记载痕迹和图像证据吗?非也!应该说,因为“蚩”字还没有被学术界所识读出来,才出现了古文字学界和考古学界,乃至古代文学界至今对这一基本问题一直是付诸阙如的现象。本文核心要点就是考证并识读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蚩尤”。

一、商周彝铭学对“蚩”、“尤”二字的识读与考证

在“蚩尤”二字中,“尤”字早已经被识读出来了。如:

①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第401页。

② 李学勤:《炎帝、黄帝、蚩尤在涿鹿》,2007年10月7日给《根源》发刊词。